

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建立

□ 何海根

开辟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新纪元的俄国十月革命，又叫苏维埃武装起义或布尔什维克革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是由列宁创建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与之对应的是被称为“孟什维克”的政治派别。

多数派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俄语音译，两个派别都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各地的26个组织选出的代表共43名，经过激烈争

论，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确定《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由于代表成分比较复杂，会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在讨论党章的第1条文即党员资格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列宁提出来的草案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反对列宁提出的这个条文，他提出的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虽然这两个条文在字面上的差别只是“参加和不参加党的组织”，但却包含原则性的分歧。列宁把党看作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只有每个党员都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才能保证全体党员都能够受到党的教育，形成高度的纪律性，才能保证党对每个党员的活动都能够进行切实的领导，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马尔托夫的主张是一切愿意加入党的人都可以入党，不需要他们参加党的组织，不需要用党的纪律约束他们。列宁指出，马尔托夫是要“把各色各样的人都变成党员”“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大会对这个问题有分歧，马尔托夫的主张占了优势，最终以28票对22票（1票弃权）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应该说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缺陷。

不过，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由于几名反火星派的代表退出了大会，因此列宁和他的支持者占了多数。领导机关包括《火星报》编委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3人都属于“火星派”（列宁属于“火星派”的一员），《火星报》编委会的3人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总委员会的5人由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会各推选2人，另在大会选举第五名委员，结果由普列汉诺夫当选第五名委员和总委会主席。这样在党中央的3个机构6位领导人中，“火星派”5位，占绝大多数，只有马尔托夫1人处于少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重建伊始就形成了两个派别，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专有名词。

布尔什维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期间围绕党章第1条所进行的斗争，本质上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组织纪律严密、有坚强战斗力、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如果按照马尔托夫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就变成了一个成分复杂、不定型、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治团体。两种主张的冲突，以及二大之后孟什维克的派别活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孟什维克继续坚持每个同情党的人都可以自行宣布成为党员，而不用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他们把集中制说成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认为它把党变成了由中央委员会当厂长的“大工厂”，把党员变成了“小轮子”和“小螺丝钉”，把集中制说成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为了进一步驳斥孟什维克的谬论，列宁在1904年2—5月写作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他指出：党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组成，他们是先进的有觉悟的；党只有成为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部队，才能起作用；党必须根据集中制组织起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党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形式，它与工会、合作社等有着严格的区别，党能够领导这些“其他一切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去团结和组织群众。他还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列宁不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分裂，但孟什维克并没有同意他的耐心阐释以及讲和方案，还操纵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一些布尔什维克开除出中央，扩大孟什维克的人数，并规定未经“批准”，列宁无权刊印任何东西，布尔什维克的刊物不能运回俄国。鉴于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日益加剧，为了摆脱党内的危机，列宁认为有必要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经过列宁的有力推动，三大于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而是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代表大会修订了党章，采用了列宁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唯一领导中心等。孟什维克召开的代表大会提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反对武装起义，主张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要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至无

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很明显，孟什维克的路线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翻版。

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政党

三大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并存，在形式上同属一个党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除了两名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与会代表绝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六大重新确定了新的革命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而孟什维克继续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七大上，由列宁提议，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2年，苏联成立，1925年在十四大上，党的名称改为了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在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过程中，列宁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布尔什维克党在理论和组织上都更加成熟了。列宁后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建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



外家擅朝

——西汉衰亡史鉴（中）

□ 吴小乔

汉元帝刘奭死后，其皇后王政君的势力日渐增强，王家人作为外戚，开始影响西汉的命运。更要命的是，她的寿命还很长，西汉的衰亡，可以说她是幕后推手之一。

刘奭甫一即位，随即任命他的大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第二年又封舅父王崇为安成侯。这时諫大夫杨兴说，汉高祖刘邦早就定下规矩“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有这样的忠諫之臣，是国之幸，倘若能纳其言，西汉或能止其颓势。可惜汉成帝刘奭缺少远见，不堪大任。

当时的王凤还没有大权在握，还很惶恐，上书请求辞职退休，成帝刘奭不批准。后来在公元前27年，刘奭竟又分别对五位舅父封侯，时人以“五侯”称之。如此重用外戚，刘奭便给西汉政权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成帝在纳諫、决断方面，还要强于元帝。比如丞相匡衡建议他，多了解过去兴衰得失，“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等等，他都“敬纳其言”。比如，陈汤曾因罪下狱当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他辩护称“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成帝下令释放了陈汤，但剥夺爵位贬为士伍。当时成帝还下令说，死刑条文有千余条，律令繁多，应减少死刑、简化条文。

而在用人上，成帝刘奭也还是有不少善举的。比如在前朝被贬的刘向，就被起用为光禄大夫。而王凤虽是外戚，也很懂得用人。比如陈汤被贬后，王凤把他收归帐下，幕府大事都由陈汤决定。王凤很器重杜钦，把他安置在幕府为官，当时的很多善政，大多出自杜钦的建议和谋划。而杜钦多次推荐贤士，让他们一起补救政误，推进善治。比如当时黄河决口，杜钦就向王凤推荐了王延世。王延世出奇招，用竹子编成四头大车、九人合抱的竹筏，再装上石头，堵上了决口。成帝就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封关内侯。

但是，善治也是遵循短板理论的。刘奭虽有若干长处，但一个好色过甚，一个不能解决外戚干政，正是这两大短板，最终让刘奭骤然身死，西汉加速衰落。

在权力问题上，刘奭一再谦让软弱，最终大权旁落，王凤掌握了国家大权。大权旁落，自己也知道，却仍不能有所动作，这只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王凤大权在手，便开始打击异己。杜钦劝他不要过于张扬，他也听不进去。当时，琅琊太守杨彤与王凤是姻亲，因治下发生灾害，丞相王商查问。王凤求

情，但王商不听，秉公查办，进而上奏请求罢免杨彤。王凤因此便恨上了王商，于是“阴求其短”，拿着王商的一点疑似短处便开始弹劾。这样的打击报复，在雄主那里，根本不可能得逞。但在庸主那里，却屡屡能成。

当时成帝刘奭认为，王凤找的这些材料都无法证明是事实，也不足以构成大罪，可以说他的智商是够用的。王凤听成帝如此一说，便固执争辩，要把此事交付查办，结果成帝居然就同意了。然后，当然就查出了一些阴险不实之词。成帝因一向器重王商，心中也明白这是故意针对他，于是指示说不要追究了。但是，基于他说了不算的权力格局，他的指示当然不能落实。最终，王商被罢免，三天后，发病吐血而亡。

一定意义上说，王凤打击王商的故事，揭示了古今许多人不敢担当、不敢秉公执法办事的根本原因。王凤们的“不对称打击”，让那些想持守公正、想干点事的人投鼠忌器，因为秉公办事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会因此而得罪一些人，因而就可能被他们搜罗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来，甚而被诬告，结果就在升迁等关键时刻受到影响。于是，很多人只好向各种势力妥协乃至放水，或者就是为官不为或慢作为，在关键问题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后来，一直到王凤身死，刘奭也没敢罢黜王凤，反而因此让一些良臣受到迫害，真是一再地自毁长城、自断根基。

王凤专权终于告一段落，刘奭应该做点正事了吧？可是，他不但没干正事，反而开始放纵其好色的这一毛病，常微服出行，寻奇猎艳。于是，阳阿公主家的歌舞女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登上历史舞台。这姐妹俩虽有绝色却无品德。赵飞燕入宫不久，便进谗言，导致许皇后被废，不久自己就如愿上位当了皇后。同时，这姐妹俩嫉妒心极强，残害刘奭子嗣。她们为求美而服“息肌丸”，导致终身不孕，结果便是刘奭没了接班人。刘奭自己则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最终暴死。

汉成帝在位26年，当政时间并不短。倘是个英主，就有足够的时间干成大事。他的智商不算低，可以说有足够的的能力妄乱为治。遗憾的是，软弱与好色两大致命弱点，让他非但不能阻止西汉下滑之势，反而使之加速。班彪在评价刘奭时也不禁一叹：“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叹息）！”确乎，今天读来也是一声沉重叹息。



（上接1版）

中医药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的理念和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的“辨证论治”“固本培元”“大医精诚”等医学理念，倡导的“春捂秋冻、寓医于食”以及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养生理念和方法，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发展中医药，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文化的引领、精神的支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发挥其独特文化价值，将中医理念外化于行、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是全面建设健康中国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

对健康有了更高的需求，渴望活得健康、不生病、少生病。中医药强调整体观、系统论和辩证论治思维，具有“治未病”、简单易行、经济方便、便于推广的鲜明特点，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极大地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发挥两种医学叠加效应，扩大优质健康服务供给，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疫病独特优势，也是维护国家公共安全战略需要。

中医药具有“全产业链”特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中医药贯通一二三产业，从以中药材种植为重点的农业、以中药产业为重点的工业到以医疗养生保健为重点的服务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产生新型业态，激活经济、吸纳就业、巩固脱贫成果、建设生态环境。2019年，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达7300亿元，一些贫困地区把发展中药材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

我国拥有2.5亿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为中医药健康养老和康复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中药生产方面，传统的名优产品畅销海内外，但部分发达国家中药产业对我国形成倒逼，中药产业既有前景也有压力。大力发展中医药，释放新供给，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集群，促进经济调结构、转方式，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中医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是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的桥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位推动中医药“走出去”，与多个国家元首倡议加强中医药合作，推动举办金砖国家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同多个国家分享中医药诊疗经验，选派专家赴外开展生命救援，展示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目前，中医药已成为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靓丽名片。推动

中医药与其他医学交流合作，讲好中医药故事、展示中医药魅力，对于促进民心相通、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深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建成以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为龙头，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到2022年，基本实现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

提高服务供给质量。坚持中医医院姓“中”定位，修订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健全评价和绩效考核制度，强化以中医药服务为主的办院

模式和服务功能。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打造中医疗未病健康工程升级版，实施中医药特色康复能力提升工程，发挥中医药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独特作用。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国家中医药防治基地。聚焦重大疑难疾病，实施中西医临床协作，提升诊疗水平。

加强特色人才培养。无论是院校教育还是师承教育，都必须注重临床实践。改革院校教育，强化经典课程教学，建立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课程体系。完善师承教育制度，优化师承教育项目。实施好岐黄工程项目，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定期评选表彰制度。

强化传承和创新。加强古籍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推动改革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抓紧布局建设一批中医药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入开展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组织科研攻关，讲明白说清楚中医药的疗效，筛选发布一批中医治疗优势病种、适宜技术、疗效独特的中药品种。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让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推动中医药开放发展。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布局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海外中医药中心，打造对外交流的示范窗口。积极参与国际传统医学相关规则制定，发布中医药国际标准。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加强与台湾地区中医药交流合作。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中医药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好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和各级中医药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及时研究解决中医药重大问题。坚持依法发展中医药，加强中医药管理体系建设，构建鼓励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三医联动新机制”。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打造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发展中医药是济世利民、造福人类的宏伟事业。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

（作者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